

◀（上接 12 版）

所举历史学家卡根就在一篇论文中把基辛格与修昔底德类比,又如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鲍威尔据说就在办公室悬挂修昔底德警句,而这种影响最可能源于西点军校或海军战争学院的修昔底德课程教学。如果勉为其难,权作抛砖,则只好“以偏概全”试举文献如下。

第一种可说是完全处于冷战时代——弗里斯(Peter J. Fliess)所著《修昔底德与两极国际政治》(*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1966),作者虽声明类比历史容易导致许多误解,但不妨暂借两极时代的国际政治关切,去探索分析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战争与政治,他的这一尝试在当时得到诸如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国际政治学者怀特(Martin Wight)等著名学者的支持。第二种是一本新著,《修昔底德论战略》(*Thucydides on Strategy*,2010)由来自希腊的长期从事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的学者普拉蒂阿(Athenassios G. Platias)与人合著,该书一方面盛赞修昔底德创发了“战略”这一概念,可与中国《孙子兵法》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媲美,另一方面出于现代战略的关切,试图从修昔底德书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战略原则,这对于相关思考颇具参考价值。

接下来是三本文集。一是勒博(Richard Ned Lebow)与人合编的《霸权对抗:从修昔底德到核武时代》(*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1991),该文集源于1988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旨在凝聚历史与国际政治两类学者共同探讨修昔底德,参与者不乏名家,比如古史专家康诺(W. R. Connor)、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名家吉尔平等,正如编者引言所称,文集作者们没有谁指名当代,但所有人都借助修昔底德来反观现在,他们的学术视野紧密关注着今天的现实冲突与本质动力。该册可谓冷战结束前夕学者们充满现实政治意识的修昔底德研讨结果。第二本文集是事隔24年之后即2012年又一次历史与政治学学者交叉研讨后的论文结集,由陶尔(Christian

R. Thauer)与人合编,分为上、下册先后出版题名《修昔底德与政治秩序》(*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Order*,2015,2016)。最后一本文集是古斯塔夫森(Lowell S. Gustafson)编辑的《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理论:一项永久财富》(*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Lasting Possession*,2000),这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集,由诸多著名学者参与,论题集中了修昔底德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地位、民主政制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关系、权力与道德、伯里克利问题,以及美国与雅典的对比讨论等等。

最后举出一本以作为本部分的结束——约翰逊(Laurie M. Johnson)所著《修昔底德、霍布斯以及对现实主义的解释》(*Thucydides, 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1993),该书批评国际政治学界滥用修昔底德,指出许多引用不过是寻章摘句,甚至张冠李戴,以书中人物代言修昔底德,并且在思想源流上混同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作者从“人性”、“正义”以及“领导权与政制”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两位思想人物的具体差异,以此“警醒”学界慎用修昔底德,实际上是一部面对国际政治学界而作出的出色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哲学研究

修昔底德之作,固然是一部历史书,也是一部国际政治研究,但还非常“哲学”——同类作品中还从未有过一本具有如此鲜明的哲学性格,它完全可与柏拉图许多论题相互阐发,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开创性人物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具有紧密渊源关系,毫无疑问,政治哲学研究是理解修昔底德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不承认是最重要一环的话。笔者最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修昔底德与其他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之间,如果有“对话”,他们可能交谈些什么;二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学派

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当然,这两个方面彼此交汇很多。

伟大人物之间的对话,总是引人入胜的,如果修昔底德“受

邀”与伯里克利、柏拉图对谈,或者后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来读修昔底德,会让我们捕捉到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

首先,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的思想关系复杂,甚至令人疑惑,比如他们是否同样认可雅典及其帝国?这个问题也是争论已久,前文“历史问题研究”部分所举《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由法国学者罗茉莉写于1947年。此外还有以下两本新作值得关注。一是福斯特(Edith Foster)的《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以及伯里克利式帝国主义》(*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2010),该书力驳前人把修昔底德思想等同于伯里克利雅典帝国主义的观点,证明指出,修昔底德在战争历史叙事,与通过演讲等构建的人物角色伯里克利这两者之间,是明显保持有张力的,举例来说,历史叙事所呈现的雅典,与书中人物伯里克利所展现或所追求的雅典,二者是很不一致的,而这种不一致很值得推敲。二是泰勒(Martha C. Taylor)《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观念》(*Thucydides, Pericles, and the Idea of Athen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2010),也努力证明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不完全认同,要点之一即伯里克利以海军及海上为雅典根本,但修昔底德书写的历史却时时呈现雅典城以及所在地阿提卡地区(Attic)对于雅典更本质的意义。应该说以上这三本书很有助于我们推进对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复杂思想关系的解答。

其次的“对话”是修昔底德与柏拉图,他们二人迥异之程度,甚至称得上是哲学的两极,对此最著名的评论莫过于尼采:我的重生,我的偏爱,医治拯救我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直是修昔底德;面对现实,柏拉图胆怯退缩了,于是他逃入理想,修昔底德则控制住了自己,从而也掌控了现实。但同时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又有许多议题重叠,比如雅典使节在斯巴达的演讲中说,雅典追求权力与帝国不过是遵循了人类通则,又如雅典人在与弥罗斯人对话中说,强者统治而弱者屈服;而同样的

（下转 14 版）▶

伟大人物“对话”外,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修昔底德研究。可以稍带夸张地说,当前对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研究几乎就由施特劳斯率先开启,并且这一领域几乎就是其学派的“天下”。

施特劳斯作为开启性的正式著作是两种,一是《城邦与人》书中的第三章“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战争’”(“III. On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The City and Man*,1964),二是论文“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Gods in Thucydides’ Works”,in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1985;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此外还有两种身后面世的书面资料:演讲稿“修昔底德与政治史学的意义”(“Thucydides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History”,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1989;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修昔底德研讨课文字纪录(1962年)与音频纪录(1972—73年)(Leo Strauss Center, <http://le 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page/2/0>)。

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处于他本人整个的哲学之下,为应对现代理性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思想危机,施特劳斯回到古代希腊,致力于恢复“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以作为解决良方;其中修昔底德所呈现的“前哲学”的,亦即本然样态的、实际的政治世界,为寻求古典政治理性提供了最好出发点,这个实际的世界,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也是一个帝国压迫与反抗或屈服的世界;克服这一“残酷”世界的办法,并非是今人一再称引的以雅典人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而是修昔底德式的智慧与这种智慧之下产生的人道——在政治的地基上,对人之为

人所能达到的高度的观察,对人之必然限度的清醒意识与适度防范,以及对政治之无可消除的悲剧性的某种程度的减缓。这一切,施特劳斯称之为修昔底德式的政治理性主义,一种近乎从奥林匹亚诸神的高度俯看人类政治世界的智慧。并且修昔底德的书写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实践性”的教育过程,正如霍布斯所率先指出,读者被请入政治现场,随着修昔底德的指引,以一种情景代入的方式,在智识上重新经历这一场最为政治的历史过程,从而去接近这种智慧与人道。

施特劳斯的这一解读,最好继承于欧文(Clifford Orwin)所著《修昔底德的人道之维》(*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1994),该书可视为“开山者”之后最重要代表作。该书论述更为精详全面,尤其更为详尽论证呈现书中人物狄奥多托斯(Diodotus)与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认为可作为修昔底德式的智慧与人道,亦即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

此外该学派还有众多成员发表有重要论著,试按主要议题举要如下:

1、雅典与帝国主义问题 比如布吕尔(Christopher Bruell)“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Thucydides’ View of Athenian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8, No. 1, Mar., 1974);福德“修昔底德论雅典帝国主义的成因”(“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0, No.2,Jun,1986)。

2、“问题青年”亚西比德 比如福德《统治的热望》(*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1989;有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0年);帕尔默“亚西比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僭政问题”(Alcibiades and the Question of Tyranny in Thucydide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15, No. 1, Mar., 1982),《荣耀之爱与公共善》(*Love of Glory and the Common Good*,1992)。

3、修昔底德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 如阿瑞兹杜夫(Peter J. Ahrens-dorf)“修昔底德对现实主义的现实批判”(“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Polity*,Vol. 30, No. 2 Winter,1997;有中译,见拙编《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福德“国际现实主义与政治科学: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与新现实主义”(“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ucydides, Machiavelli, and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1995;有中译,同上编)。当然实际议题远不止此,还有比如正义与虔敬、城邦与民主政制、党争、雅典瘟疫等等,读者可以根据已列举文献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找。



古希腊的三列桨座战船浮雕